

到梧桐树下开了家咖啡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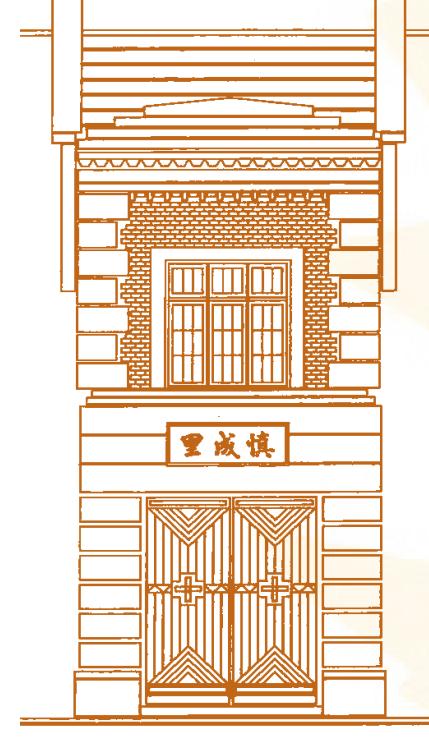
日前,纪录片《梧桐树下老房子》在央视财经频道热映。其记录的上海老房子及所在街区更新背后的故事引人入胜。

在上海,有一位青年学者钻研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空间活化多年,为了更好地探讨如何让历史街区“活”在当下,跑去“梧桐区”开了一家咖啡店。她就是同济大学博士后研究员、“LANERS初心会客厅”主任王溪。

一晃四年,一个中酸甜苦辣凝结成收获与心得。王溪向记者——一道来。

本报记者 柳森

一家咖啡店 就是一个社交媒体



城市周刊:你出生在古都西安,成长于城墙脚下,如今选择将“遗产保护”作为自己专攻的研究方向。可以讲讲你和慎成里结缘的故事吗?

王溪:我的研究方向是“文化遗产保护”,随着研究的深入,包括我、合作导师赵蔚副教授在内的很多学者都深切地意识到:所谓“遗产”不是只属于博物馆或艺术、学术殿堂里的宏大叙事,而是每个人日常生活中愿意珍藏的记忆。也就是说,“遗产”不应该被束之高阁,只是严格、审慎地当作保护对象,而应该以更细腻的方式激活。这种意识愈发强烈以后,我们就产生了将学术研究与具体的地域空间相结合的愿望。

后来也是机缘巧合,我们的愿望有了实现的机会。建于1931年的慎成里位于永嘉路291号,由建筑师缪凯伯设计,内有十五幢联排石库门房子,2015年全部被列为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。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,徐汇区启动慎成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工程,整个工程的内容包含了房屋保护性修缮、弄堂及沿街环境整治等社区空间质量提升工作。

为了更好地提升社区空间的品质,徐汇区房管局联合文旅局等有关部门、天平路街道,将慎成里弄堂公共空间,沿街立面以及弄堂口两侧的房屋面向社会发起“社区微更新”竞赛。其左侧第一间“市房间”,历史上是这个弄堂口的老虎灶所在地,被“预留”为社区会客厅,请参赛者提出该空间的使用、运营、维护方案。

我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团队Wedesign21取得了第一名。会客厅的实际运营由我带领的双创团队“城市历史景观创新研究平台”承接。我们为这个空间起了个正式的名称“LANERS初心会客厅”。后来,弄堂里的阿姨爷叔们给我们叫着叫着叫成了“老虎灶喫咖啡”。我们觉得很接地气,就沿用了下来。



均 受访者供图

慎成里之所以吸引我们成为“营造”它的一员,一方面因为它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,另一方面这次保护修缮是以“保人保房”的方式展开的——仅对房屋、环境作保护性修缮,居民仍在原地居住。这个“保人保房”从我们研究的角度是非常推崇的,而且我们深知“保人保房”在上海有多不容易,于是很想为这个项目的探索尽一份力。

城市周刊:为什么会选择利用这处空间开一家咖啡店?

王溪:传统的石库门里弄,标志性的社交空间就是弄堂口,承载着人们对上海里弄的记忆和情感。直到今天,我们仍然希望弄堂口可以是文化展示的窗口、居民之间联络情感的所在。综合考虑空间既有的规模和属性,我们想到了把它打造为一处以咖啡店为主体的“弄堂口的会客厅”。

之所以选择开一家咖啡店,不仅因为上海是一座咖啡文化深厚的城市,这

街区保护离理想状态 又近了一点

城市周刊:从一开始进来要修缮这个空间,到让它慢慢变得像一家咖啡店,这个过程进展得还顺利吗?

王溪:我觉得这个过程每天都是新

的过程。受新冠疫情的影响,一开始,我们请来专业的咖啡师负责日常运营,我们团队主要围绕着这个“基地”做教研活动;疫情后,我们就全权接手店里的所有工作了,等于既要制作咖啡,又要跟街坊邻里交流。围绕街坊邻里开展的口述史整理工作也是从那时开始的。这样的工作状态也奠定了这个空间的未来走向。

城市周刊:你的同行怎么看待你的这种状态?在他们的眼中,你是一个研究者,还是和他们一样,就是店主?

王溪:他们都叫我“王老师”,知道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叫作“遗产社区保护”。只是与传统意义上的研究不同的是,我们创新了概念和方法,全身心地投入其中,以自己的创业行动为载体,参与到遗产社区的日常生活及其社区空间的活化中。

在这样一个被我们定义为“人居遗产社区保护和发展”的过程中,可以有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进来,当然也有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的关切需要纳入考量。

四年的探索时间严格来说并不算长,但有一条逻辑我们感到已经走通了。那就是,如果我们可以在有人生活的历史街区,形成一个文化交互、社会交往密度足够的社区空间,其本质上是社会网络的载体,就能够支撑这个街区步入一个良性的保护、发展状态。

这样一个理论体系是我们这几年在慎成里一边探索,一边做案例研究、做扎根式的社会调查才得以形成的。至少在目前来看,它的适用性还是比较强的。让既保历史文化又保社会文脉,在有居民生活的历史风貌保护区,不再是一种空泛的想象。

下一步的挑战在于,当我们在理论上走通了以后,还要和现实生活做更多的对接。毕竟,社区也好,相关的委办局也好,大家都有一套做事的逻辑、方法和规矩。我们可以做的,是寻找更多让大家能够一起合力做事的机会,在合作

的过程中,探索让街区更有活力、高质量发展更可持续的方法。

在这个过程中,咖啡是我的一个“缓冲器”。我们经营这家咖啡店是自负盈亏的。现在整个咖啡店行业涌人的竞争者越来越多、毛利越摊越薄,当我为实现基本营收苦思冥想的时候,还能坐下来喝一杯,跟居民聊天。

城市周刊:用现在年轻人时髦说法,这叫“疗愈自己”。

王溪:我的这个疗愈是聊天的“聊”。附近的居民和我们熟了以后,很喜欢路过了就进来聊上几句。我们这里也是一个“疗愈室”。

这个街区的状态 可以更好

城市周刊:同在“梧桐区”,永嘉路这一片和其他片区还挺不一样。你成为这个街区的一分子多年,觉得它现在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了吗?还是说,它未来仍需更进一步的“营造”,变得更有力一些?

王溪:这个问题可能得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。第一,我们怎么去识别这样一个遗产社区,它的价值和空间范围到底是什么样的。第二,基于更科学、有效的空间识别与界定,助力相关的支持、活化政策层层落地。

在空间识别方面,是有一套成熟的科学方法的。比如,通过居民带领的空间口述史整理,可以让我们站在居民的视角,更全面地看待整个遗产社区的前世今生。

往往是在这样的视角下,我们就会发现,遗产社区的范围往往不是以既有的行政边界为界的。它的实际范围有时会跨出行政边界一点,叠加一些犬牙交错的地带。这些空间在本质上属于同一个文化片区。



▲ “LANERS 初心会客厅”位于慎成里弄堂口,曾是该弄老虎灶所在地。

► 柜面上的磁吸板贴满了照片,记录下咖啡店与社区紧密相连的珍贵瞬间。

◄ 围绕慎成里元素、老虎灶IP设计的文创是店里一大特色。

▼ 王溪(右二)正在带领市民开展 CityWalk 活动,了解慎成里及其所在街区的前世今生。



这就要求研究者从研究优先的立场入手,把遗产社区的价值空间的边界识别出来。在此基础上,再去讨论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策略、方法,呼吁相关部门联动,实现更有效的保护、活化。

当然,上述工作需要从顶层开始做。需要规划部门在规划中使用新的方法,把相关空间中的这些区域识别出来。有了这个顶层的空间概念之后,才能把政策层层落地,才能够设计与实际需求相符的细化办法。

目前,我们相当一部分遗产社区的保护与活化工作是基于“居住型历史建筑修缮”和“15分钟社区生活圈”的划定开展的。由于“15分钟社区生活圈”的划定主要是为街区的属地化管理服务,而遗产街区的空间往往基于历史积淀而来,有时候不是以属地化为单位的,在实际工作中,就会遇到保护、活化工作因突破“生活圈”边界,得不到政策和公共资源支持的尴尬。

好消息是,上述边界因为很多行动者的积极努力而有所松动。他们的行动所呈现出来的效果,已经接近我们研究中理想的“人居遗产社区”的保护和发展状态。比如,衡复风貌区以“一路一弄”“花园街区”为抓手进行街道和弄内环境的微更新,一些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已实现从建筑本体成套完善到文化、文旅整合传播的综合性打造。

而我们店自身,最近也在尝试通过开展“瓶盒回收”“咖啡+再利用”等活动动员居民参与,通过市集、快闪店等形式进行跨区联动,孵化历史风貌街区活化、拉近邻里关系的新支点、新契机。

希望通过营造一个以行动者为主力的“圈层”,支持更多梧桐树下老房子及其所在街区的保护与活化。

如今,在“梧桐区”,最重要的一对

外接口就是咖啡店。虽说“卷”了一点,但也倒逼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主理人,用自己的十八般武艺,去把自己所热爱的事业“经营”得更好,努力做出更好的“成绩”。

观察

从伦理学角度看让座纷争

■ 孔文清

近些年,在地铁上就让座产生的纷争屡有发生,引发了广泛关注和争论。

没有给老人等有需要的人让座,是否应该被谴责?老人是否有权要求他人为自己让座?厘清这些基本问题,对于引导社会舆论,塑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不让座的人应受谴责吗

逼让座现象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,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老人、孕妇、怀抱婴儿等有需要的人,在碰到没有人给自己让座时,有些会对没给自己让座的人进行谴责。那么,要求别人给自己让座,是否合乎伦理道德呢?

中华伦理传统有一个重要的精神是:伦理道德要求是人伦关系中的双方各尽自己对对方的义务。以父子关系为例。站在父母的角度,其义务是慈。站在子女的角度,其义务则是孝。

这一思想蕴含的主张是人伦关系的角色各尽义务,而没有主张人伦关系中的角色有自己的道德权利。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特点很多时候已经被忘却了,很多人将对方对自己的义务看作了自己的权利,而去主张之。

即便不从传统伦理的角度看,要求别人做对自己好的事情这一做法,

确的文字和图形标识,标明这些座位是特地提供给老、弱、病、残以及怀孕和怀抱婴儿者使用的。爱心专座因此就有了与其他不对号入座的座位不一样的属性。坐在爱心专座上、不属于照顾对象的乘客,是有明确的道德义务给有需要的人让座的。

因此,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种情况:坐在非爱心专座上、没有给老人等有需要的人让座的人,他们是不应受到谴责的;坐在爱心专座上却没有为有需要的人让座的人,情况则不一样了。

爱心专座赋予了坐在这类座位上的人,为有需要的人让座的明确道德义务。在没有需要使用这类座位的人时候,其他人可以先使用这些座位。但一旦来了需要使用这些座位的人,他们就有义务为需要的人让座。如果他们没有做到,是应受谴责的。

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明确的道德义务对于义务人是有约束力的,如果没有履行应尽的义务,就应受谴责。

当然,对于没有履行道德义务的人的谴责,应该止于指出他们是不道

德的,可以对他们进行劝导、谴责,不能进行谩骂。

可以要求别人给自己让座吗

逼让座现象之所以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,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老人、孕妇、怀抱婴儿等有需要的人,在碰到没有人给自己让座时,有些会对没给自己让座的人进行谴责。那么,要求别人给自己让座,是否合乎伦理道德呢?

中华伦理传统有一个重要的精神是:伦理道德要求是人伦关系中的双方各尽自己对对方的义务。以父子关系为例。站在父母的角度,其义务是慈。站在子女的角度,其义务则是孝。

这一思想蕴含的主张是人伦关系的角色各尽义务,而没有主张人伦关系中的角色有自己的道德权利。传统伦理道德中的这一特点很多时候已经被忘却了,很多人将对方对自己的义务看作了自己的权利,而去主张之。

即便不从传统伦理的角度看,要求别人做对自己好的事情这一做法,

也是与道德的含义相悖的。所谓道德,其基本的含义是利他,即做对他人的事,而不是做对自己好的事。别人遇到了困难,没有东西吃,你给他吃的,这种行为是利他的、道德的。自己肚子饿了,让自己吃饱,这是对自己的好,并不能说是道德的。

就此而言,一个人要求他人做对自己好的事,是在主张他人应该有利于自己。即便这一要求表面上符合某种道德规范,其实质上是以利他之名行利己之实。从这个角度而言,老人等需要帮助的人,并不能将别人给自己让座当作一种道德权利加以主张。

当然,需要帮助的人可以请求别人帮助自己,但请求别人帮助自己,和主张自己的权利是不一样的。一个请求别人帮助的人,不会在别人没有答应自己的请求时对别人进行谴责、谩骂。另外,虽然需要座位的人不能要求别人给自己让座,但旁观者可以以社会舆论的方式,要求坐在爱心专座上的人为有需要的人让座。他们并非为自己谋取利益,其行为是正当的。

道德也有界限

不久前,上海地铁上一年轻人坐在爱心专座上,拒绝给老人让座,气愤的老人上手拉拽。上海地铁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在回复记者时表示,地铁车厢虽设有“爱心专座”,但未强制必须让座。许多人对管理方的回应不满,认为“既然不强制,设爱心座位干啥?”这里涉及的问题是:对于不履行明确义务的人,能否强制其履行义务?

对此,要明确的是,对道德问题不能诉诸暴力等强制手段,而要在道德的范围内予以应对。如前所述,当事人要要求别人做有利于自己的事,是不合乎伦理道德精神的。诉诸暴力的强制,则更加地不合乎道德。

那么,作为管理者的地铁管理方是否能对不履行义务者予以强制?

在笔者看来,道德义务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,是人们自觉自愿遵守。但对于一定社会时期形成的、明确的道德义务,却不能简单地认为想履行就履行,

不想履行就不履行。

道德的非强制性,或者说自愿性,表明的是道德规范或义务根源于人与人之间的情谊。人们做有利于他人的事往往是出于自己对他人的关心和爱等情感,但这并不意味着负有明确道德义务的人可以不履行道德义务。

从这一角度而言,管理方的回应是错误的。他们应该明确年轻人不让座的行为是错误的。他坐在爱心专座上,应当为有需要的人让座。

社会上不道德的事情固然让人气愤,但我们也要“止于善”,明确道德的界限。不能以与道德不相符的方式去促成道德。这样做不仅不能取得成效,还会对道德造成损害。

对于有明确的让座义务却不让座的人,社会舆论应当旗帜鲜明地予以谴责,指出当事人有明确的义务给需要的人让座。但与此同时,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,抑或是管理机构,不能逾越界限、诉诸任何形式的暴力或强制。

(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)